本书是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的课堂笔记，由于是从笔记成书，体例便未采取陈作一般的中国传统竖行繁体排版。虽不是陈寅恪亲自执笔书写，但大体上保留了陈氏基本的研究风格。陈氏的史学功夫，考据部分基本沿袭中国史学传统，且积累极为深厚；而分析梳理部分，应该是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史学的方法，像是阶级分析，陈寅恪应该是中国史学界较早使用此范式的。陈寅恪的分析过程明白晓畅，直接清楚，体现其对历史极高的把握力。虽有些概括未免过于粗略而在微观上有失准确，但作为相关领域的开拓者，陈氏对后来者的启发之大，似无出其右。同样使用阶级分析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其分析之僵化死板，生搬硬套，远不能望陈氏之项背。

阶级分析的好处，在于可以将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微观行为放在一个宏观的框架之下进行审视，但微观与宏观并不能总是一一对应，由微观向宏观的跳跃之中失真在所难免，但如若未有更好的理解之道，也不妨将其视为向更深层迈进的歇脚之处。而且这个步骤应是单向的，反向的展开往往陷入削足适履的圈套。陈氏在评价魏晋递嬗之时，认为曹魏代表了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氏则是儒家豪族的代表。曹操其实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寒族，尤其在汉魏禅让，越登皇族之后，但说曹氏的执政与东汉末以儒学为重的世家大族来说，确有其相对立、偏于寒士的一面，此时可算得上是进步的力量。而司马氏夺权时所直接考虑的，大体也不会是什么儒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的斗争，更多无非是从权力的角度来考量。而司马家族的当政，风格与其儒家豪族的身份的确相关联。陈氏的分析仍是有道理的，但宏观的观念不能直接在微观中生效，却可用“无意识”的说法来解释宏观至微观的投射，尺度的变化解释也随之不同。（即使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后续的研究也对陈氏的观点提出了修正）

包括本书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都曾提到，我国历史上的民族的划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民族”的说法固然是近代以后西方文化东传的后果，但要说先前没有“民族”或类似的意识存在，则一定是错误的。集体的划分是人类的天性，重要的是划分的标准为何。中华文明圈这种以文化来区分民族的特点，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并未出现（如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化的蛮族将领仍被当时和后来者视为“蛮族”），这既是一种包容的特征，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华文明的主体一直未曾改变（至少名称上如此）。

其他部分陈氏的叙述都清晰明了，似暂无可供笔者多语之处（盖是因笔者未治魏晋史之故）。这里仍不妨留下一些比较史的视角，魏晋南北朝之际的西方，陷入了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至少西欧是如此），而对于古代世界的中国，这段时期是一次调整与重组，是中国古典时代盛世的前传，西方的古典时期则早已远去。常有人认为中国是早熟的，以至于近代便早早衰落，其实不然，虽然同享一个“轴心时代”，但中国的古典时代远比西方跨越的时期要长，其鼎盛也来得要晚。或许如今亦是这般。